



适度的“罪富文化”，有利于中国更多的富人成为慈善家，使社会更加公平。

我们需要“罪富文化”

卢周来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人习惯“红眼病”，有“仇富情结”，还把“仇富情结”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一贯的东西，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对富人持排斥态度，在西方文化中更加深厚，这源于基督教对“富人原罪”的说法。在基督教的传统中，认为富人天生就是“罪恶之人”，应当下地狱，富人要想进入天堂，唯一的途径就是将自己的财富全部捐赠给穷人。

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也有“罪富文化”。中国古代

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先前调查“国民读书习惯”时，那些对“去年你读过几本书”作尴尬回答的人，给出的理由都是“忙不过来”、“没有时间”。但是前两年出现了一个新的答复，大多数年轻人给的是：“我一看书就头晕。”

而且，还真有年轻人走进书店或图书馆，看到一排排书架，就感到心口不适，胸闷憋气，需要赶快奔出去，以免晕倒。

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严重，所以特地报告医学界，请他们注意：“晕书综合征”听说是全球性的，却在中国蔓延扩展速度特别快，尤其是在青少年中，扩散迅速。

得此病的人，或许是被中国的成堆教科书和教辅材料气昏了头脑，看到文字

富人乐善好施的传统也相当久远，但为何到了今天，这种文化传统反而对中国富人失去了作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罪富文化”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摧毁；整个民族心理由“罪富”变成了“崇富”；富人成了人人仰慕的对象。

搜狐网站总裁张朝阳算得上中国富人中的一个异数，在某次福布斯中国论坛上，张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的富人都在喊中国人有强烈的‘仇富情结’。我却认为中国不仅不仇富而且很崇富，人人都希望自己成

晕书综合征

就恼火。

这个病在中国造成的危害很惊人，据调查，中国人每年平均阅读量为0.7本书，日本人4本，韩国人7本，法国人11本。

不少文化学家说，不用着急，这是后现代、图像时代、影视时代，全世界的人都离书本越来越远。也有文化学家说，知识结构正在改变，不读书不等于没有知识。我这里倒是有个数字：中国人有“读书习惯”的，从几年前的7%，降到2004年的5%。而英国有“读书习惯”的，从1977年的54%，升到2002年的65%。如果不读书就是后现代，中国的

确比世界任何国家先进。在每个国家，读书出现越来越严重的阶层性：2002年英国统计，1/4人口读书5本以上，半数人口读书5本以上，剩余的1/4则读书20本以上，两极分化严重。美国N.E.A调查，国人有“读书习惯”的约为38%，但在南美裔移民中，只有26.5%。

读不读书，可能无法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却是一个社会品格的标志之一。很多现代社会学学家说，当代社会，是一个普遍“感性商品化”的社会，上层要保持品位，就不得不再三提高香水的号牌、香檳的品牌、手提包的价

值。所以，中国富豪热衷于私人慈善事业相比较，中国富豪们的整体形象并不佳：一方面在生活上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对慈善事业十分吝啬。

美国《时代》周刊前年关于中国富豪生活方式的报道曾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文章认为，很多中国富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家致富，财富给他们带来的仅仅是盲从和眩晕。很多时候，他们所做的已经仅仅是无度的挥霍，更是愚蠢的攀比。

为了使中国富人成为慈善家，我还是主张需要适度的“罪富文化”。适度的“罪富文化”，有利于中国更多的富人成为慈善家，使社会更加公平。

摘自《莫愁》

神明，所以与女性热衷于私人慈善事业相比较，中国富豪们的整体形象并不佳：一方面在生活上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对慈善事业十分吝啬。

美国《时代》周刊前年关于中国富豪生活方式的报道曾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文章认为，很多中国富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家致富，财富给他们带来的仅仅是盲从和眩晕。很多时候，他们所做的已经仅仅是无度的挥霍，更是愚蠢的攀比。

为了使中国富人成为慈善家，我还是主张需要适度的“罪富文化”。适度的“罪富文化”，有利于中国更多的富人成为慈善家，使社会更加公平。

摘自《莫愁》

这些社会学家没有看到，读书与知识范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阶层指标，而且随着读者减少，这个格局间隔越拉越大。

抽象地谈“开卷有益”，已经说服不了当今的年轻人。但是我有一则统计，可以让中国潇潇洒洒患“晕书症”的男性青年，吓得认真听一下：伦敦《泰晤士报》2008年6月7日报道，企鹅出版公司研究部调查了2000位女性，其中有85%认为，不管是聊天闲谈，还是谈情说爱，如果对面男士大谈阔论，就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让她产生爱慕。

如果中国女性也爱读书的男性，“晕书症”瘟疫在中国的蔓延，或许就能被阻挡。因此，从长远看，从几代人的角度看，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谈恋爱的小女子手中。

摘自《女友·花园》

在美国密歇根州比拉镇附近的农场里，农场的主人养了一头公牛，他用铁链把牛锁在了一棵榆树上。健壮的公牛经常拖着重重的铁链围着榆树奔跑。日复一日，铁链在距离地面约3英尺的树干上勒出了一道沟痕。数年之后，铁链已深深地嵌在了树皮中，和树干牢牢地长在了一起。有一年，密歇根州遭

榆树上的铁链

冯新

到“荷兰榆树病”的袭击，大片的榆树染病枯萎死亡。人们都以为这棵高大、古老的榆树肯定不会幸免。

令人惊奇的是，这棵榆树并没有死亡，反而长得越加茁壮。大灾过后，它成了该地区唯一一棵

依然挺立的榆树，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密歇根州州立大学的植物病理学家对这棵神奇的榆树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专家得出结论，正是那条铁链拯救了榆树的生命。榆树从生锈的铁链上吸收了

大量的铁质，对致病菌产生了很强的免疫力。曾经的苦难或许孕育着未来的希望；过去的创伤或许正是我们应对生存危机的力量。海明威曾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摘自《知识窗》

日本农民让人眼红

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日本的时候，从东京乘坐新干线到京都，一路下来，居然没发现农村。卡特很奇怪，同行的日本人告诉他，日本的城市与农村，从外观上看是没有区别的，从建筑的样式到公共设施的配备，从生活习惯到人的精神状态，都大致相仿。

我在一位日本农民家做客，这家有6口人，住3套房，每套面积190平方米。家中有3辆汽车，还有一个农具仓库，里面放满各式各样的农具，家中的生活设施也应有尽有。让我惊叹不已的是，男主人是兰花专家，养了许多名贵的兰花，但他从来没有卖过一盆，养兰花仅仅是为了消遣。

由于农村的空气质量好，也不像城市那样拥挤，日本不少上班族在城市上班却住在农村。在东京、大阪这样的超级城市，这种情形更为普

遍。于是，在农村出现了一个与城市一般无二的生活小区。久而久之，生活习惯也同化了，再倒回城市就别扭了。真正反映“城乡差别”的是人均收入这一指标。据有关记载，日本自从1973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居民以来，这一状况一直持续至今，没有改变。日本5%的富豪人口中，农民占据主要的份额，年收入千万日元的农民极为常见。20世纪90年代后，城市受泡沫经济的影响比农村更大，因此，“倒城乡差别”反被拉大了。

究其原因，可从以下四方面考察：第一，日本人向来追求平等，反对过大的差别，所以，有城乡趋同的历史传统；第二，日本是个保守的国家，他们非常重视传统文化，非常重视民族凝聚力，所以农村不可能被城市抛弃；第三，日

本政府对农民实行特殊保护政策，比如，长期以来实行保护大米价格的政策，并限制大米进口，以维护农民利益；第四，有农民自己的组织——劳动组合协会保护农民的利益。

在日本，一提到农民，人们流露的不是鄙视，而是羡慕。日本农民不仅收入高于城里人，而且生活的舒适度也高于城里人。农民的劳动强度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农民的田园之乐则是城里人所没有的。日本没有强制性户籍制度，任何人想在城市落户，都可以在15分钟的时间内办完手续，但是并没有一窝蜂拥向城市的事情发生，因为不少人不想在城市生活。所以，大城市的人口总能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农村的出生率也并不明显高于城市，日本

做有用的事

王利盛

多元，两年内付清，利息全免。同样是游走街头，菲律宾一处乡镇曾有吸毒前科的街童，在地方机构的协助之下，靠“收取垃圾费”和“协助做垃圾分类”而有正式的收入，甚至高于当地一个上班族的薪水。他们可以用这笔钱来帮助自己和家庭脱离贫穷，也可以继续读书。

来自德意志语城的报道

则指出，为了帮助失业的人，一名国会议员想出新的方法，雇请领取失业救济金的贫民到学校看守厕所，防止学生在墙上涂鸦，给师生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

有用？没用？取决于的标准其实是：有没有被利用的价值。但是，一听到“利用”两个字，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有些不舒服。但话说回来，我们必须先

没有限制生育的政策，舆论上倒是经常表扬那些孩子多的家庭。记得我在日本留学时，听过这样一个报道：九州有一位生了11个孩子的妇女，一时间简直成了英雄，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农民素质较高。因为按照一般通行的理论，人的素质与人口出生率呈现一种负相关关系：素质越高，出生率便越低，西方国家普遍如此。日本全国人口已亿2000万，这一数字已经保持了数十年，至今没有什么变化。

也有人担心，“倒城乡差别”终究也是一种差别，差别总不是好事，应该抑制农民致富的速度。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日本的“倒城乡差别”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协调发展。在任何国家，农民都属于弱势群体，有意地提高他们的地位，对日本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有益的。

摘自《乡镇论坛》

分辨清楚是被谁所利用。如果被奸小利用，做些鸡鸣狗盗的事，当然不值得；但如果能够被大众所利用，做的是有益公众的事，人生就有了不凡的价值。

很多有用的人，每天忙着做有用的事。很多看起来没用的人，却以积极的态度，做了有用的事。他们因为对别人的付出，为自己改变了灰败的命运，所以造就了有用的人生。摘自《今日文摘》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 zzwzbwh1616@sina.com

邓小平临终无遗憾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境外的媒体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

1997年2月，医院的报告说邓小平病危。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中，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秘书通常在东西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他喜欢看

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每天上午10点，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家到301医院不过十公里，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可是在301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病榻周围常常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

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那个，”他问，“是谁啊？”

卓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吧。”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琳告诉他，这部纪录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老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他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到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他一声不吭。就是

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但总是不说话。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人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民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1997年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亲人坐在沙发上，全都默然不语。整座楼一片寂静，就像是死神已经降临。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出一句话，唯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宝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2月19日21时08分，这位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摘自《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黑并略有麻子之一大汉也。”

1926年，萧楚女应邀来到黄埔军校演讲，来听课的人特别多，校方临时决定将会场改在大操场。由于当时没有扩音设备，萧楚女几乎是边喊边讲了。“再大声点！声！”后面的学生仍在大喊。萧楚女略停了片刻，吸口气，运足了劲，把声音提到最大限度……突然，“啪”的一声，他只觉腰间陡然一松，裤带崩断了，忙按住了裤子。台下的人都聚精会神地盯着，丝毫没有察觉到他的窘迫。萧楚女就这样一手叉腰，一手挥臂，讲了整整90分钟。事后，他对朋友说：“此为平生第一窘事。”此后，他再也不用腰带，而改用保险系数更大的背带了。

摘自《半月选读》

近代名流的趣闻掌故

研究文字学的，因慕陈独秀之名，特地来监狱看他。两人一见如故，道话投机，交换著作、文稿。然后，两人推心置腹，侃侃而谈。

起初，双方都心平气和，互称知己。突然，两人为了一个“父”字的解释，热烈争论起来，闹得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拍桌对骂，几乎动武。陈独秀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人行事。”而那位程老先生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

同狱室的濮德志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了，并说：“学术讨论应该心平气和，不应发火。”又随口诌出几句打油诗：一日执杖一曰

火，二翁不动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生气，幸勿动怒敲脑壳。

程老先生听了这首打油诗，笑了；陈独秀则嬉笑道：“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你的脑壳。”濮德志笑着说：“我岂止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无知。”

萧楚女：为演讲讲裤带

1922年，萧楚女去四川开展工作，担任《新蜀报》主笔，以“楚女”之名发表文章。很快一封封求爱信飞到了编辑部。萧楚女便在报上刊登了启事：“本报有楚女者，绝非楚楚动人的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

黑并略有麻子之一大汉也。”

1926年，萧楚女应邀来到黄埔军校演讲，来听课的人特别多，校方临时决定将会场改在大操场。由于当时没有扩音设备，萧楚女几乎是边喊边讲了。“再大声点！声！”后面的学生仍在大喊。萧楚女略停了片刻，吸口气，运足了劲，把声音提到最大限度……突然，“啪”的一声，他只觉腰间陡然一松，裤带崩断了，忙按住了裤子。台下的人都聚精会神地盯着，丝毫没有察觉到他的窘迫。萧楚女就这样一手叉腰，一手挥臂，讲了整整90分钟。事后，他对朋友说：“此为平生第一窘事。”此后，他再也不用腰带，而改用保险系数更大的背带了。

摘自《半月选读》

南北腔调

苏童

耳赤起来。虽然我不是故意把“橘子”叫成“概子”的，我也并不知道在那位同学的老家橘子的意思是怎样说话的。记得有一次，一个舌头好像又短了一截。”

我大概是属于舌头短了一截的种类，就这样短着舌头说了四年的普通话，后来到了南京工作，我已经想不起来刚到南京时是怎样说话的，据我的相交十余年的几个朋友回忆，我当初是说着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的，光听我说话没人猜得出我是南方人。朋友们这么说，大概不是恭维，假如不是恭维，其中多少又揭露了我的现状。那些话的潜台词是：你以为你现在说的是普通话，其实那普通话已经很不标准了。

大概是入乡随俗，我

无法沉默的爱

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离婚法律比较宽松。几周以后，在故乡维也纳，哈耶克如愿以偿地迎娶了第二任妻子海伦娜。此后，他们相依相爱，共同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

哈耶克当初做出离婚的决定是艰难的，尤其是妻子赫拉一方并无任何过错。这一举动使哈耶克的完美的道德形象受到了巨大的损害。他在英国任教的最后一年半中，承受了相当大的舆论压力。

哈耶克最好的朋友、经济学家罗宾斯因此与之决裂。罗宾斯写道：“我觉得，他的那种做法与我心目中对他的人识不符。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如果看到他的继任者，我就会觉得难以忍受的痛苦。”直到哈耶克的前任妻子赫拉去世后，俩人才开始寻求和解。1961年，在哈耶克儿子拉里的婚礼上，俩人终于重归于好。

裁判。我记得他用充满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们沉吟了一会儿说：“你们说得还行，不过听上去一个好头长了点，一个舌头好像又短了一截。”

我大概是属于舌头短了一截的种类，就这样短着舌头说了四年的普通话，后来到了南京工作，我已经想不起来刚到南京时是怎样说话的，据我的相交十余年的几个朋友回忆，我当初是说着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的，光听我说话没人猜得出我是南方人。朋友们这么说，大概不是恭维，假如不是恭维，其中多少又揭露了我的现状。那些话的潜台词是：你以为你现在说的是普通话，其实那普通话已经很不标准了。

大概是入乡随俗，我

到南京没几年就学会了南京话，当南京话说得可以乱真时，我的一口普通话就坐着火车返回北京了。有一次一个多年不见的同学打电话到我家，听我的声音竟然大吃一惊，说：“你的舌头怎么了？”我也惊愕，反问道：“我的舌头怎么了？”他说：“怎么又往前跑啦？又像两蛮嘛舌之人！”

这个电话让我百感交集，我想这对于我大概是个无法置换的悲哀。我的舌头在经历了多年风雨后，又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说谁谁忍不住地往前跑，懒得再卷着舌着，它按揭生在我嘴里运动，我知道我现在说着一口无规无矩的南京腔如苏州腔的普通话。

或许这不是我一人一人的悲哀，人在漂泊的生活中常常适时地变换语言，人永远都比鸚鵡高明聪明，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南腔北调的缘故吧。

摘自《文苑》

福。她不想离婚，最后我强行离婚了。这肯定是错误的，但我还是做了。可能是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吧。”通往幸福的道路上，为什么最聪明的人也要跌跌撞撞呢？

是否幸福，这种感觉只有自己才知道。即便是最理性、最智慧的思想家，也时常为某种无法控制的“内在冲动”所驱使、所控制。这种“内在冲动”究竟是什么？

是爱情，是“几番魂梦与君同”的爱情，是“相逢犹恐是梦中”的爱情，是九死而不悔、百折而不挠的爱情。

爱情不是一个事件，不是一种契约，爱情是一种直接指向幸福方向的执著，是与世界疏离过程中的一次精神回望。

我们每个人，都是某人一生的至爱。伟大如哈耶克者，平凡如你我者，都将经历伟大的爱情，因为没有爱情的爱情，是完全不值得过的人生。

摘自《新周报》